

東城隨筆·人物篇

徐家禎 著



東城隨筆 · 人物篇

徐家禎 著



國際華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城随笔人物篇/徐家祯著. -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4. 6

(澳洲华文文学方阵/庄伟杰主编)

ISBN 0-644-11287-5

I. 东… II. 徐… III. 散文随笔-作品集-当代 IV. 158

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6 号

责任编辑: 诗 烨

封面设计: 沈 鹭

版式制作: 费勤义

刘鹭珊

书 名	东城随笔人物篇
作 者	徐家祯
出版发行	国际华文出版社
印 刷	奔驰艺术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0-644-11287-5/I·47
定 价	RMB:25.00 元 A\$:15.00 元

地 址 (1800)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
中国联络 (361005)厦门市顶沃仔 12 号 067 信箱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文学潜在的力量

——《澳洲华文文学方阵》出版前言

● 庄伟杰

沧海横流，时序更叠。

我曾经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过，今天的澳洲华文文学已形成富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作为自身带有强烈的东方(中国)文化色彩的澳华作家，在澳洲多元文化背景下，俨然是一个边缘族群，常有一种边缘文化人的感觉。他们处在民族性与开放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在有意或无意的行为与语言中砥砺着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或归宿，由是而派生出另类的文化空间，本人称之为——“第三文化”。既不愿丢弃自身的文化意识或中国形象，又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现实，这便是“第三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更确切地说，如果自身的文化浸润并用母语书写的原在性是“第一文化”(原文化)，而

移植于异质土壤、受西方文化气候熏染的潜化性是“第二文化”(异文化或他文化),那么,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之中派生营造的文化景观,即为“第三文化”。我这样的描述,是否合适妥当并无十分把握,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放眼全球华文文学的地形图,除本土的中国文学之外,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阵容,如今已被学术界划分为四大主要版块:台、港、澳文学为第一大版块,东南亚诸国华文文学为第二大版块,澳洲(新西兰)华文文学为第三大版块,美(国)加(拿大)华文文学为第四大版块(如果欧洲华文文学也列为一大版块的话,应为五大主要版块)。澳洲华文文学从起步到发展虽然较迟,但从近十多年的迅速崛起,从华文作家人数的递增和华文写作的蔚然成风,意味着这里已形成属于自身特色的文学场,它不仅丰富了华文文学世界,在倡导多元文化社会的澳洲痛苦地绽放出中华文化的美丽精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促进澳中文化交流,让国人更好地了解海外华人的生活面貌、更好地认识澳洲的人文风情,将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

文学潜在的力量是惊人的,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史以来。这是谁也无法否定事实。

如果说,不久前(2002年10月)由中国海峡文艺出版社向海内外隆重推出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是第一套反映澳华文学概貌的大型文学图书,堪称“澳华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的话,那么,《澳洲华文文学方阵》则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澳华诗人作家的创作实绩和成果,为海内外各界特别是学术界提供澳

华作家们真实的个案文本和第一手研究资料，多角度、多侧面、大范围地呈现澳洲华文文学的写作气势和阵容。它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让华人眼中多姿的异域文化，让作家笔下多彩的心灵世界，立体而开放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放眼居住全球各地的华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从来就不缺少先行者，从来也不缺少文化的传播者。许多白纸黑字留下的不管是历史的记录、文化的记录、或是心灵的记录，都在不断地丰富着一部令人感叹的海外华人历史。

华人进入澳大利亚已走过 150 多年的里程，在这个幽长幽长的、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隧道里，华文文学在艰辛而美丽的穿行中以自身的特质和形态，真实而艺术反映了这个族群的文学形象，反映这些近似“精神流浪者”的人生境遇和心路印痕，它必将成为当代华人世界的一份独特而沉重的资源，成为一座凝聚着悲欣交集的生命结晶体或精神殿堂。

这套以“方阵”而命名的澳华文学书系，以选取现代新诗、散文诗、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纪实特写和文艺评论等为主的个人结集。所有加盟的作家均是生活和定居于澳大利亚的华文诗人作家，他们中有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诸国来的新老移民，多数是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或新移民。在澳洲，没有专业或专职的作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行动着、拼搏着，而写作，对于内心世界丰富而敏感的写作者，同样是一种十分有趣、自由而朴素的生命方式。他（她）们中的职业也不尽相同，或则处于一种“变数”状态。可以说，他们是占澳洲总人口仅百之四的华人中的一份

子,就像骑在羊背上的国度上俨然生长的一株株桉树,分散遍布于这块新大陆,并且以各自伸展的枝桠、触角和根须,精彩而无奈、曲折而生动地蔓延着、张扬着……

在疯狂的工作和沉重的生存压力之下,能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作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去真实地面对世界、面对人生、面对自我,既回到内心、又跃动着人类生命的思考,既面临自我挑战的文化认同、又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声音……也许,这便是这个“方阵”所折射出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当我的目光停留在这些用方块字组合的文本之中,我恍然置身于南十字星空的蔚蓝背景下,那些飘荡的云朵、闪烁的星光仿佛缤纷着我的视线,牵引着我的思绪。然而,我周身最激动的部位,是我这颗强烈跳荡的心!

麻木的心灵是不会激动的,激动是一种本能,它与生命的全部奥秘纠缠在一块。正因为如此,我曾经说过,为了将澳华文学的特色衬托得更加鲜明,我最大的愿望是要以澳洲华文文学丛书、澳洲华文文学方阵、澳洲华文文学(作家)大系作为一个系列工程逐渐地推出,从而形成对澳洲华文文学从面到阵到点的完整的呈现。对此,我称之为澳华文学“三部曲”。如今,“丛书”的出版愿望实现了,“方阵”正在热烈的运作中,而“大系”相信当指日可待。

我焦灼而渴望的眼睛,正指向我们情感寄托的那些闪烁着母语灵光的符号中,并寄予在佑护着我们头顶的那同一片蓝天!

我深知，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中艰难地行进的澳华文学，在当下可能会遭遇令人猝不及防的困境，然而，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和网络化时代，除了外在的诸种因素外，最为关键的，可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资源。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分子，作家的能量和内在释放源自于自身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如何对自我灵魂进行拷问？如何对生存境遇深入追问？如何更好地张扬母语的诗性光芒？这些都是值得澳华作家不断思考的问题。

站在特定的“第三文化”空间上，作为一个边缘族群，在陆地上想跳进水里，在水里却想跳上岸来，而置身于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和交融、拒绝和认同、寻梦和圆梦的现实“磁场”，澳华文学这棵生命之树将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枝叶来？又会形成什么样的品质和精神向度？等等，这同样是引人关注的焦点。

在浪迹的颠簸中，生命定然会有特异的疼痛。然而，生命在颠簸中却充满快感和欢愉，尽管生命也难以承受长久的磨损。我们感慨的只是生命本身——他们那么集中地聚汇在一起，聚汇在一个特定的跨文化时空里，用同一种方式表现和安顿自己的灵魂。他们在自己精神的田园里培植和耕耘，留下了寻找的悲歌、跋涉的声迹，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窘迫中，却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某种群体性特征映现，展露了一段流浪或漂泊的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以选取作家个人结集而自由组合的

“方阵”，经过一番精心酝酿，由庄伟杰策划并担任主编，张奥列担任常务编委，将陆续由国际华文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由部分富有热情和创作实力、活跃在澳华文坛且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诗人、作家和学者组成强大的编委阵容。他们是：黄雍廉、李明晏、张典姊、庄伟杰、张奥列、何与怀、冰夫、陆扬烈、马白、林达、凌之、林茂生、张劲帆、徐家祯、李南方、蒋中元等；此外，澳华文化传媒和社团界的热心人士关公关、钱静华、许耀林、郭凡、吴景亮、苏珊娜、任传功、娄伟等负责推广。为扩大影响，产生必要的效应，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海内外有识之士对澳华文学的现状和发展以及传播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方阵”诚邀澳中两地部分文坛名家、学者担任顾问予以指导。谨此，我们深表谢忱！

文学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就是纯粹的力量。当生命回到文学和创造本身，便趋于纯粹；当离开了它们，即失去了这种品质。人类是不可以也不可能没有文学的，我们坚信！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应该是深入生命和灵魂的真切而清晰的人，是勇于探索并且不断创新的开拓者，而寻求超越则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激情。唯其如此，才能产生奇迹，也才能走进诗境，并拥有诗意的生活，从而创造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大写人生！

姑且以这篇所谓的“前言”，为《澳洲华文文学方阵》的问世鸣锣开道、呐喊助阵吧！

写于 2003 年仲秋

自序

徐家祯

《东城随笔》是我在墨尔本《海潮报》和《汉声杂志》上开设的一个专栏总名。在这一专栏上前后一共发表过几十篇随笔、散文、杂感和书评。

记得一九八三年二月来到澳洲之后，我正式开始为澳洲的华文报刊、杂志写文章，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在这之前，我的文章大多在中国大陆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间或，也有在香港杂志上登出的。为澳洲华文杂志和报纸写文章的起因是有一时期我当了南澳中华会馆的通讯员，要给墨尔本的《汉声杂志》提供关于南澳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南澳华人社团的消息。不想，这类通讯报道没有写出几篇，散文、随笔倒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于是索性就不再将稿件寄去北半球，渐渐地专给澳洲的华文报纸、杂志写起专栏来。期间也有中断的时候，但是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现在，不想已有十七年之久了！

我第一个开设的有名称的专栏叫《南澳散记》，这组散

文创作于一九八八年五月至十月的五个月中，那是应悉尼《华声报》社长杨汉勇先生的邀请而写的。《南澳散记》总共二十多万字，在《华声报》上连载一年多，到一九八九年年底才载完。后来几经周折，到一九九一年十月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了单行本。

《南澳散记》刚写完，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墨尔本又开始发行了一份华文周报，叫《海潮报》，社长洪绍平先生也来电约稿。于是我就决定开设另一个专栏，就叫《东城随笔》。《东城随笔》的第一篇文章叫《“古风尚存否”有感之一》，写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在《海潮报》的第六期（一九八九年一月）上。这就是《东城随笔》专栏的诞生。

这个专栏之所以叫《东城随笔》是因为我一九八七年初买的新居位于阿德莱德城东，于是家父就给我的新居取了“东城书屋”这个名称，还请上海几位书法家写了横批。其中学者兼书法家的周退密先生在他写的横批上还加了一段注释：

注

“家祯世讲老屋，杭州城东，有泉石之胜，厉樊榭《东城杂记》曾记其处。兹卜筑澳洲阿德雷得市东偏，以‘东城书屋’颜其居。殆君子不忘其旧欤。率书奉贺，即请教正。四明退密。”

退密先生注中所谓的杭州东城老屋，当指我家以前的

大房子，在杭州城东横河桥、金洞桥一带。老屋名叫“娱园”（一名“榆园”），原是许增（字迈孙，号益斋）的旧居，是杭州的一所名园，民国初年卖给我的曾祖父。四九年改朝换代之后，该园让工厂占用，就此败落。前几年杭州房屋改造，将娱园旧屋彻底拆毁，重建高楼，从此“娱园”就只剩了一个历史名称。多年以前，据家父老师张惠衣先生考证，娱园原为清初玉玲珑馆的旧址。清朝雍正年间学者厉鹗（字樊榭）的《东城杂记》中多处专门提到这座有名的庭院。我在澳洲所购的第一个住处正在阿德雷得城东，所以，家父就把它取名为“东城书屋”，这也就是退密先生所说“君子不忘其旧”的来历。

《东城随笔》从一九八九年一月开始在《海潮报》（后改名为《新海潮》）登载，一直登到一九九零年三月或者四月，共发表散文、杂感等文章三十六篇（报上的编号是四十九，这是因为长文分割成几次发表，中间可能还有错号的缘故），二十万字左右吧。那时，《新海潮》正准备改成月报，而我的文章却越写越长，于是就把《东城随笔》专栏转到墨尔本的《汉声杂志》去了，因为《汉声》是月刊，容量大些，可以登载长文。在《新海潮》，我又开了一个新的专栏，叫《西窗漫话》，想专门发表一些可以一次登完的短文。但是实际上，后来在那个专栏发表的文章还是很长，还得分割几次发表，这就是后话了，不用在此赘述。

《东城随笔》的第二部分在《汉声》杂志延续了五年有余，从一九九零年七月号开始到一九九五年八月号结束，共

发表长短文章十七篇，其中包括连载了十一个月长达八、九万字的〈外公、外婆及其他〉。以后，我就不再继续《东城随笔》这一专栏了。此后在《汉声》发表的文章都叫做《山居杂忆》，这是我和家母合开的专栏，后来这些回忆性文章就以同名出版了单行本。

《东城随笔》两个部分的五十三篇文章共有四十万字左右，虽以记人、记事的散文和随笔为主，却也有时事杂感和书评，还有读书的感想，甚至包括译诗一篇。我个人觉得《东城随笔》的语言和文笔，比起《南澳散记》来，要显得老练、成熟一点。可是不知怎么，我所见到的对于《东城随笔》的评论，却远比对《南澳散记》的要少得多。可见评论家、读者和作者这三者对于同样作品的看法会有多大的不同！可是，不管怎样，我自己对于《东城随笔》中的大部分文章还是情有独钟的。我觉得这是我文思泉涌、写作欲最旺盛时期的产品。

正因为《东城随笔》的内容比较繁杂，篇幅又比较庞大，所以要单独出书就有点困难。我觉得最容易解决的办法就是先把其中写人的散文集中起来出个单行本，其余的散文、随笔和杂感可以放到以后再说。这就是我编写这本《东城随笔人物篇》的动机。

《东城随笔人物篇》共收长长短短记人散文十五篇，都在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过，有的还刊登过不止一次。除〈倪兄〉、〈阿四老太〉、〈我的父母〉、〈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和〈老李〉之外，其余九篇都曾包括在《东城随笔》专栏

里。其中〈邻居之死〉和〈廿四叔叔〉两篇还都曾登在马来西亚的文学杂志《蕉风》上。

〈倪兄〉、〈阿四老太〉、〈我的父母〉、〈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这几篇都是《山居杂忆》中的文章。这次也收在《东城随笔人物篇》里的原因各不相同：〈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是跟《东城随笔》中的〈云间朱孔阳逸事〉两篇有关的。〈云间朱孔阳逸事〉那两篇散文篇幅都不很长，写的是朱孔阳先生点滴二三事，有点像绘画里的 sketch，只是粗线条的两张小素描。所以这次再把〈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跟它们放在一起，想使读者对朱孔阳先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东城随笔》里的〈外公、外婆及其他〉及〈补遗〉虽然很长，但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的外公、外婆。这次加进《山居杂忆》里的〈我的父母〉，那是从我母亲的角度来看我的外公、外婆了。所以，也能使读者对所写人物有一个立体感。至于〈倪兄〉和〈阿四老太〉，虽然原也收在《山居杂忆》中，但实际上却都是由我所写。我的作品中，属于幽默、讽刺风格的不多，这两篇可以算是例外，不想割爱，所以虽然原来并不属于《东城随笔》，也收进来凑数。〈倪兄〉这篇以前曾在墨尔本《大洋报》上单独发表过。

《山居杂忆》中的文章，不管是家母作文、由我整理的也好，全是我写的也好，都一律用家母的口气来叙事。这次，把《山居杂忆》中的四篇文章收入本书，仍保持原来的文字，所以，那四篇文章中的“我”不是指笔者，而是指家母；“我的父母”当然也不是指笔者的父母，而是笔者的外祖父、母。

为了澄清这类称呼问题，我特在这四篇文章的标题下一概加上“高诵芬作文，徐家祯整理”字样。

这次在《东城随笔人物篇》里收进的十五篇文章中，写的人物虽不算多，但却属于不同类型：有写我的亲戚的〈外甥女毛毛〉、〈叔祖父礼耕先生〉、〈廿四叔叔〉、〈外公、外婆及其他〉、〈外公、外婆及其他〉（补遗）和〈我的父母〉六篇；有写我或我家庭朋友的〈云间朱孔阳逸事〉、〈云间朱孔阳逸事〉（续）、〈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忆老万〉和〈倪兄〉五篇；有写我家仆人的〈老李〉一篇；有写我邻居的〈邻居之死〉和〈阿四老太〉两篇；还有写传教士的〈传教士〉一篇。这些人物有的早已故世，有的却还活着；有的生活在中国，有的却居住在海外；有的跟我关系密切，有的却仅有数面之交；有的在现代社会早难以找到，有的却还在身边、随处可见。

除了为将有关的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做了调整之外，其余文章都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最早的一篇〈云间朱孔阳逸事〉写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最后一篇〈倪兄〉写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前后跨度达七年之久，从中很可以看出我散文风格的变化。

在这十四篇记人散文中，我想特别提及的是〈外公、外婆及其他〉和〈邻居之死〉两篇。

〈外公、外婆及其他〉是这本书的重心，篇幅几乎占全书的一半。这不但因为外公、外婆是我身边最重要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亲人之一，而且也因为我外公家在杭州的重要

地位。我外公姓高。高家在杭州曾有“高半城”之称。高家旧宅原在双陈巷、孩儿巷一带，是杭州著名大宅之一，据说太平天国时一度做过王府，现在当然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关于高家的传说、故事很多。我从耳闻目睹的事实和传说出发，把我外公、外婆的一生跟杭州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融合为一体，最后又把正文写完以及发表之后读者的反馈写成一个长达两万多字的〈补遗〉，加在正文之后。我觉得，这是写人物的一种很特殊的写法。

写完〈外公、外婆及其他〉之后，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我缺乏书面资料来证实我外公的家史。高家作为一个世族大家，以前当然保存有完整的家谱，据说可以上溯到南宋时代的南迁始祖，前后有近千年历史！但是，可惜在“文化革命”之中，这些宝贵的材料都丧失殆尽了。十年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书店里买到清朝大藏书家丁丙著的《武林坊巷志》第二册。回澳洲后竟然发现其中有不少关于我外公高家的历史资料，可惜很是零碎不全。为了得到更多史料，我前后大约花了七、八年时间，终于从不同渠道收齐了《武林坊巷志》全套八册。根据这八册书中提供的零碎史料，再加别的有限的几种工具书，我竟然考证出了高家的南迁始祖叫高琼，原籍山东蒙城，任御龙直指挥史、保大军节度、殿前都指挥使、检校太尉等职。在宋王朝南迁时，高琼随高宗南下，因护卫皇帝有功，被封为“卫国王”，谥曰“武烈”，并以下四代均封为王，定居浙东山阴县（今绍兴）前梅里。据说那里至今仍有“五王祠”。乾

隆初期，高琼的后代高士禎(梅溪公)迁居杭州，成为迁杭始祖，至今亦已三百年了。根据我所拥有的有限资料，自高士禎以后至今九代，现在我基本上都可以排列出来了。这是一件很有趣的考证工作。现在我也想把这张“世系表”(Family Tree)附在文后。

《邻居之死》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记人散文，看起来像是小说，其实却句句真实。不过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该文的清雅冲淡、平直舒缓。我一向赞同周作人先生对于散文创作的主张。周先生说：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雨天的书》：〈序二〉)

“总之闲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的事也。”(《瓜豆集》：〈自己的文章〉)

我也同周先生一样，时时总想写出一些平淡自然的散文、随笔来，但是，却常常不能如意。只不过我觉得我的写人的几篇散文，倒大多可算是达到了这个境界。尤其是《邻居之死》那篇，可以做我的闲适散文的代表。所以我多次跟友人说过：要是有人要编写一本选集，只准我挑选一篇代表